
遗址博物馆的特点与规建

孙华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遗址博物馆是保管、诠释/展陈和研究一个遗址出土文物与遗迹的社会公共机构、馆舍和场所。遗址博物馆不宜与区域博物馆或其他类型博物馆共用馆舍,但应承担起保护、管理和研究整个遗址的职责。遗址博物馆主馆的选址最好在遗址边缘或原先遗址的主要出入口处;主馆建筑体量不宜太大,外形不应模仿遗址建筑基址的推测复原形象;无论是主馆还是重要遗迹的保护展示性建筑,都不应简单模仿和放大可移动文物的外形作为建筑造型。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要兼顾室内可移动文物陈列和露天不可移动文物的展示,统一设计整个遗址博物馆的室内和野外的展陈,合理关联主馆室内陈列游线和遗址露天展示游线。

【关键词】: 遗址 博物馆 遗址博物馆 文化遗产展示 馆舍规建 展陈设计 标志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遗址博物馆是博物馆的重要类型。近些年来,随着大型遗址保护和展示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遗址内或遗址附近兴建的遗址博物馆也日益增多,在全国各地的大型遗址上都涌现出了一些规模颇大、设计奇特的遗址博物馆馆舍。由于考古文博学界和建筑规划学界目前对遗址博物馆本身的基础研究尚有不足¹,对遗址博物馆的性质和特点认识不深,遗址博物馆的馆址规划往往不当,馆舍的建筑体量和建筑设计也缺乏依据,遗址博物馆展示缺乏特色且与遗址展示缺乏应有的关联,遗址博物馆的管理与遗址的保护和管理脱节等问题也日益显露。以下,笔者就根据自己对遗址博物馆的认识,就遗址博物馆的基本特点、遗址博物馆的馆舍建设、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要领等,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开始正文之前,笔者还需要说明遗址博物馆的定义。文化遗产领域的遗址博物馆具有广狭二义²:广义的遗址博物馆是集遗址的室内陈列和露天展示为一体的,保管、展示和研究一个遗址(或遗址群)的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机构、馆舍和场所;狭义的遗址博物馆只是某遗址(或遗址群)内或旁边的主要收藏、展示和研究该遗址或遗址群出土的可移动文物的博物馆。本文的遗址博物馆是广义的遗址博物馆。

一、遗址博物馆的特点和功能

我们知道,遗址是历史上人类聚居或集中进行某种专门活动的场所,这些场所已经废弃,原有建筑物和构筑物大部分已毁坏,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其基址还大多掩埋在地下,需要进行考古勘察、发掘和研究才能够揭示其平面布局等信息。由于遗址是以一种残破的状态出现,其地理景观和立面形态与它们成为遗址前的视觉形态差异很大。尤其是东方的以土木建筑为主体形成的遗址,往往大部分都埋藏于地表以下,地面只有少许建筑物和构筑物的遗迹露头,有的遗址甚至在地表没有任何古代遗迹的现象可寻。此外,遗址之所以成为遗址,就在于它的发展历程出现了中断,现今遗址所在区域的居民与历史上创造和使用这个聚集区的人之间通常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二者间出现发展演变的断层。遗址这些不同于其他文化遗产的特征,也决定了遗址博物馆应该具有其自身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将遗址博物馆与其他博物馆区分开来。

作者简介: 孙华(1958—),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考古学、文化遗产学。

关于遗址博物馆，不能将其仅仅理解为建立在遗址上或遗址附近的博物馆。遗址博物馆是与遗址有着密切关联、以全面展示和诠释遗址文化面貌和文化内涵为目的、具有博物馆主要功能的非营利社会教育机构。作为博物馆的一个类型，一般博物馆具有的收藏保管功能、藏品研究功能及展示教育功能，遗址博物馆都应该也必须具有。遗址博物馆作为保护、管理和诠释/展示遗址的机构，除了要反映该遗址的历史、现状和考古成果，展示该遗址出土的可移动文物外，还应该保护和管理该遗址，研究和解释所保存的遗址，并向公众全面地展示、诠释这个遗址。这些博物馆保存、研究和展示的“藏品”，包括遗址内的不可移动的“遗迹”“堆积”以及可以移动的“遗物”，而不仅仅是展陈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³。因此，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和工作任务都具有复杂性，并非仅仅营建和筹划一个文物陈列馆那样简单。

1. 遗址博物馆不宜兼作其他类型的博物馆



图一//钓鱼城遗址博物馆拟选址位置(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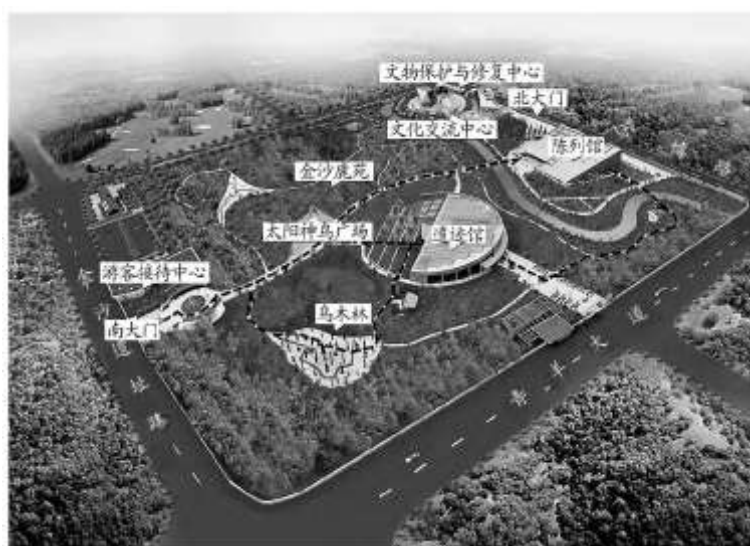
土墩墓邱承墩的原址上⁵。按照学界的意见，鸿山土墩墓群的时代为战国早期，这时越国已经灭掉吴国，吴国中心区域的这个土墩墓群的文化因素又以越文化因素为主，故学界一般都认为鸿山遗址是越国贵族的墓地，该遗址的考古报告名为《鸿山越墓发掘报告》⁶，就体现了这一点。但有关部门在规建鸿山遗址博物馆的同时又规建了中国吴文化博物馆，两馆共用同一处馆舍，只是在展陈空间分配上予以不同的安排。笔者认为，在一处典型的越文化遗址上规建吴文化博物馆，容易使参观鸿山遗址博物馆的观众发生认识上的错觉，并不一定妥当。

规划建设遗址博物馆的遗址一般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的“大遗址”，按照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制度设计，即便是国保的遗址也都归属于遗址所在区县人民政府管理，遗址博物馆自然也归属于遗址所在区县。尽管如此，遗址博物馆也不能等同于区县的综合博物馆或历史博物馆，不宜用来收藏和展示整个区县的自然人文、古代与现代的标本和文物。遗址博物馆与区域博物馆和专题博物馆，分则两利，合则两伤。

2. 遗址博物馆应该归属于遗址

遗址博物馆的展品不仅仅是遗址出土的可移动文物，更有埋藏在遗址内的不可移动文物，二者共同构成遗址博物馆的藏品和展品。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保管和保护馆藏文物，遗址博物馆的保管和保护功能也就不应只体现在保存和保护库房和展厅中的可移动文物，也应该体现在保护和管理遗址地面和地下的不可移动文物。因此，遗址博物馆应该也必须担负起保护和管理遗址的职责，没有必要既设立遗址博物馆，又设立遗址的文物保护管理所。即便有的遗址既建立博物馆又设置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也应该将二者合二为一，也就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这样就能事半功倍，有助于提高保护和管理的工作效率，有利于文物保管与文物展陈的沟通和衔接。

同样，遗址博物馆由于依附于遗址，其展示场所也突破了一般博物馆馆舍的限制，室内陈列与室外展示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遗址博物馆藏品不仅仅是陈列在展厅内或保管在库房内的可移动文物，还包括埋藏在遗址地面以下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遗址相当于博物馆的大库房；遗址博物馆的展品也不仅仅是遗址出土的文物，还包括遗址中的遗迹。因而规模较大的遗址博物馆往往还分为遗址总体展示的陈列馆和遗址现场展示的遗迹馆，有些遗址的遗迹展示馆还不止一个。



图二//金沙遗址博物馆园区

（图片来源：底图为金沙遗址博物馆提供，黑色箭头是笔者建议的优化游线）

以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为例，该遗址博物馆就不仅承担遗址的展示功能，还兼有遗址范围内考古发掘、遗址内文化遗存和出土文物的保护功能，并且这种保护不光是文物行政的保护和管理，还包括考古揭露遗迹和出土文物的科技保护与修复工作。这种遗址博物馆管理体制的设计应该还是比较理想的。在展示方面，金沙遗址博物馆分为遗迹馆和陈列馆两个主要部分，观众先去遗迹馆参观祭祀区发掘现场，再到陈列馆参观遗址的出土文物（这些文物主要出自祭祀区），以获得对遗址的遗迹和遗物的全面认识⁷。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规划颠倒了陈列馆与遗迹馆两者的前后位置，如果将陈列馆置于遗址公园入口内不远处，而将遗迹馆规建于陈列馆的后面，观众先到陈列馆了解遗址的全面信息，观看馆内陈列的出土文物，再到遗迹馆参观祭祀区发掘现场，其参观游线可能更顺畅，展陈效果也会更好（图二）。

遗址博物馆需要兼顾遗址的保护和展示，不能只是一个可移动文物的室内陈列馆和库房，否则这个陈列馆和库房可以规建在遗址所在区县的任何地方，那就不能称其为遗址博物馆了。

3. 遗址博物馆须兼顾遗址的研究

博物馆的基本功能之一是研究，尤其是博物馆的藏品研究。作为博物馆的一个类型，研究本遗址所出并被博物馆收藏和保管的藏品，这是遗址博物馆职责所在。遗址博物馆的藏品还具有复杂性，不仅有馆藏的可移动文物，还包括埋藏在遗址中的不可移动文物，只有做好二者的研究，才称得上是对遗址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⁸。遗址博物馆的藏品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遗址博物馆收藏的本遗址出土的可移动文物，以及与这些文物相关的其他遗址出土或传世文物的研究；二是遗址博物馆保存和展示的遗址范围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如已经暴露在地表或经考古发掘揭露的建筑物和构筑物遗存等，以及用以进行比较分析的其他遗址的相关文物；三是对整个遗址进行全面的研究，包括历史、现状、原貌、演变以及物质遗存背后的社会状况等。博物馆研究的范畴也不仅限于藏品，博物馆展陈和管理也应当是重要的研究内容。我们知道，博物馆另一个基本功能是陈列展示，这是体现博物馆基本属性（即为公众提供知识、学习和欣赏场所的文化教育机构）的主要途径，遗址博物馆也是如此。由于遗址博物馆既要在室内陈列可移动文物，又要露天展示遗址中的不可移动文物，陈列展示比其他历史博物馆复杂，需要开展专门的研究，以便公众能够看懂和理解遗址。此外，遗址一般都呈现废墟状态，且文物多掩埋于地下，考古发掘通常只揭示了很小一部分，遗址博物馆需要不断开展考古工作和考古研究，以给遗址带来新的理解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和深化展陈设计。遗址博物馆设置专门的考古研究部门，或考古科研机构在遗址博物馆派驻专门的考古工作站，都很有必要。

陕西临潼区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基础上扩展而成的。由于秦始皇帝陵园遗址占地广阔，仅内、外陵园就占地 56.25 平方千米，最早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只保护和展示兵马俑坑，秦始皇陵其他区域（尤其是陵园高大的封土区域等）还在当地村社的管理之下，秦始皇陵区的考古工作需要借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力量。现在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已将秦始皇陵封土等区域纳入统一管理之下，也有自己的考古队伍和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可以根据保护、展示和研究的需要对陵区实施主动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尽管由于陵区范围广大，区域内原属于村社的土地大都还没有变更土地权属，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还无法代表国家实施对整个陵区的有效管控，但博物院（包括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对秦始皇陵、秦国陵墓以及秦文化的研究工作，博物院也聚集了一批颇有声望的考古、历史、文保等方面的学者，学术研究始终走在遗址博物馆的前列，因而博物馆享有很高的声誉⁹。

遗址博物馆需要承担起遗址的研究功能或组织研究功能，不能将遗址研究全部推给遗址博物馆以外的考古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关于遗址的新研究成果成为学界共识后，也应该及时反映在展陈之中。遗址博物馆的基本陈列需要根据新认识及时更新，不宜长久不变。

二、遗址博物馆的馆舍规建

遗址博物馆，如前所述，是与遗址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与遗址一体化的博物馆。遗址博物馆不仅包括保存和展示遗址出土的可移动文物的室内陈列馆，还包括保存和展示遗址的不可移动文物的露天展示场。因为要完成保护遗址、研究遗址和展示遗址的

主要任务，遗址博物馆与通常类型的博物馆天然存在许多不同。

遗址博物馆多位于乡村荒野的遗址上，通过收集展示本遗址的文物，反映本遗址的历史及其相关问题；区域历史博物馆则通常位于城镇之中，通过征集和收藏来自整个区域的传世和出土文物，展示该区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的历史（有的综合博物馆还征集、收藏和陈列人类产生以前该区域的地质标本和生物标本，以展现该区域自然演变的历史）。遗址博物馆也不同于艺术博物馆，遗址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文物尽管也有不少属于艺术价值很高的精品，但更多的则是艺术博物馆一般不作收藏和展示的文物标本。这些看似粗陋的石器或石片、残缺不全的陶器和瓷器，乃至遗址上的砖头瓦片，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该遗址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遗址博物馆的展品还有遗址的遗迹，有些考古揭露的遗迹不宜露天展示，还需要设计建设保护和展示一体化的遗迹馆。

遗址博物馆的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它的馆舍建设要求与其他博物馆有所不同。遗址博物馆馆舍的选址位置、规划设计和形态风格都要与遗址保护、遗址风貌和遗址展示紧密关联，馆舍的规划和建设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遗址博物馆的馆舍选址

遗址博物馆馆舍依附于遗址存在，遗址保护始终应放在工作首位，遗址展示应该服从于遗址保护，不能喧宾夺主。遗址博物馆的位置应该规划在遗址范围之外，即便规划在被破坏的遗址范围内，也要采取慎重的态度，避免大体量的博物馆建筑影响遗址的风貌。博物馆的馆舍选址既不宜占压遗址，也不能脱离遗址或距离遗址过远。主馆舍占压遗址会造成对遗址的干扰和破坏，距离太近会影响遗址的环境景观，距离太远则与遗址失去了关联，不利于观众在参观博物馆的陈列馆后继续参观遗址。处理好遗址的室内文物陈列馆址与室外文物展示场所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规划设计遗址博物馆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选址于遗址之外，北面紧邻遗址的边缘。观众站在馆舍楼顶的观景廊道上可以远眺遗址，在遗址中心区参观的观众也可以远远看见天际线上露出的博物馆屋顶。二里头遗址由于被赋予了“华夏第一都”的头衔，博物馆的陈列也就不仅仅限于二里头遗址的陈列，还兼有展示夏文化和夏代历史的功能，因而博物馆的馆舍需要设计得较大，才能满足博物馆的功能需求¹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作为遗址博物馆，尽管有体量偏大的不足，但博物馆选址于遗址范围之外，位于地势稍低的伊洛河古河道处，且遗址外形设计也比较低调，对遗址的景观干扰较小。此外，如果二里头夏都遗址的方向是坐北朝南，位于遗址正南偏西的遗址博物馆就正好位于遗址公园入口的位置上，观众参观完遗址博物馆的室内陈列后，进入遗址参观室外的遗迹展示，其游线也比较顺畅（图三）。



图三//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位置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谷歌卫星地图标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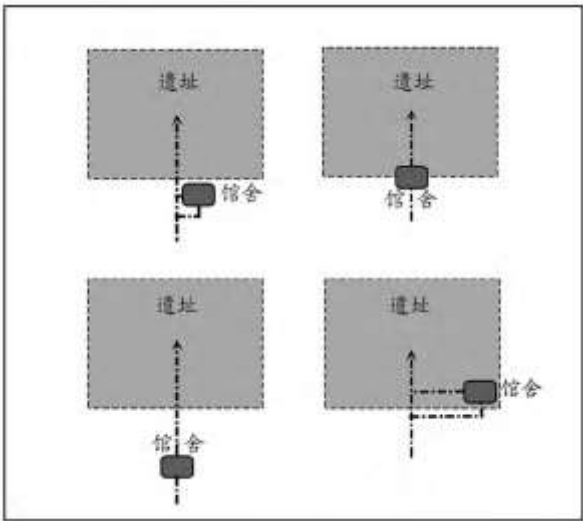
山西曲沃的晋都博物馆规建于早期晋国都城一带的曲村-天马遗址（以下简称“曲村遗址”）内，依托于北赵晋侯墓地而建¹¹。曲村遗址的范围和格局目前尚未查明，城墙、宫殿等重要功能区的位置还不清楚，地处遗址北部的北赵晋侯墓地是证明该遗址为早期晋都的最重要的地点，尽管此地点可能在当时晋都的城郊，但是也不宜将遗址博物馆规建于此区域。按照一般墓地选址于城郊地势较高处的规律，中国自然地理地势的总体规律是西北高东南低，中国古代中心地区的墓地往往位于城北或城西北，故有“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礼记·檀弓上》）的说法。曲村遗址位于曲沃盆地的塔儿山之南，地势北高南低，早期晋都城址与墓地的位置关系有可能也是“南城北墓”，即墓地在北部高处而城址在南部低处。根据这个可能，晋都遗址博物馆应选址于都城遗址北面，目前却在南面，因此给人位置别扭之感。

遗址博物馆的主馆即陈列馆在遗址旁具体位置的确定，需要在充分理解遗址的基础上慎重考量。古代的遗址，无论是史前时期的聚落还是历史时期的城市，无论是专门的矿冶作坊还是某个宗教中心，都有专门的规划或逐渐形成的主要出入口。特别是那些在比较成熟规划思想指导下营建的城市，其城址的基本朝向和主要城门都具有确定性，观众从城门的主要门址进入城址，沿着主要街道参观城址内的重要功能区，就比较容易理解这座城市遗址。因此，将遗址博物馆的馆舍选择在遗址前面的主要出入口处，是做好馆内陈列与遗址展示关联的基础，需要在建馆规划时就给予足够的重视，有条件或有可能的遗址应尽量将遗址博物馆的主要陈列馆设置在遗址原本的出入口地点（图四）。

2. 遗址博物馆的馆舍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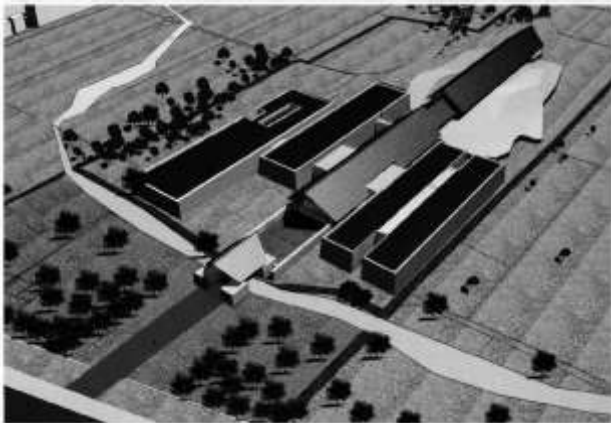
遗址博物馆馆舍建筑和展示设施不能影响和干扰遗址本体和环境，馆舍建筑的体量、高低、形式和色彩，服务设施的位置、

数量、大小和观瞻，都要与遗址相协调。尤其是那些展示遗址重要遗迹的保护性建筑，保护其内文物是建筑的首要功能，其次才是展示功能（况且展示的也是遗址的文物而非建筑本身），不能本末倒置。保护和展示遗迹的建筑应与所要保护展示的遗迹本身的形态和功能相匹配，过多的其他展示功能都是画蛇添足。这里还要再次强调的是，遗址博物馆就是向公众介绍遗址的基本情况和引导公众参观遗址的专门博物馆，不是遗址所在地的区域博物馆。给遗址博物馆赋予过多的区域博物馆的功能，不仅会使得博物馆的馆舍体量过大，影响遗址的环境和景观，还会弱化遗址博物馆与遗址的联系，制约遗址博物馆的健康发展。即便是单纯的遗址博物馆的馆舍，也要科学估算馆舍规建的建筑面积，不宜将建筑体量规建得太大。



图四//遗址博物馆选址模式示意（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重庆合川区钓鱼城遗址是南宋末期合州治所，是当时四川军政当局为抗击蒙元而构筑的一系列山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年前，笔者所见的钓鱼城遗址博物馆的一个建筑设计方案将该博物馆选址于钓鱼山下，靠近钓鱼城遗址，这是恰当的；然而，该博物馆馆舍却又是钓鱼城遗址博物馆与合川区博物馆共用，因而博物馆体量相当大。设计者尽管采取了一些降低高度、消减体量的设计手法，博物馆仍然显得过于庞大，将其放在一个即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址旁边，总给人以喧宾夺主的感觉。设计方案的博物馆主馆造型取象钓鱼山，正立面呈相对低矮的等边三角形¹²。钓鱼城遗址主城所在的钓鱼山非常险要，只有博物馆选址是相对平坦的半岛区域，在钓鱼城前建设一座横长达二百余米的“山”字形建筑，好似在山前平地上人工建造了一座小山丘，改变了钓鱼城最主要对外正面（也就是蒙元军攻城的主要方向）古战场的环境景观，建筑造型也不恰当。



图五//鸿山遗址博物馆（图片来源：崔凯《无锡鸿山遗址博物馆》，同[13]。）

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鸿山遗址博物馆是以鸿山土墩墓群为依托规划建设博物馆。博物馆主展馆选择在墓群中规模最大且进行过考古发掘的邱承墩原址上，与保护展示建筑结合在一起。土墩墓是平地起坟或浅穴起坟，墓室呈窄方条形的墓葬形制，设计师考虑到了东南地区先秦时期吴越文化的建筑风格，将墓穴上建造的保护展示建筑设计为简洁的脊长檐短、两坡两墙、纵向出入的形态¹³，这是很合适的。但由于整个遗址博物馆的馆舍都选址于邱承墩一带，使其既要承担阐释吴文化的专题博物馆任务，还要承担展示鸿山土墩墓群的功能，此外还要兼顾邱承墩土墩墓的保护与展示，设计者不得不一方面延长纵向两面坡形建筑的轴线，另一方面在邱承墩前面两侧横向设计建造了四个主展厅，以至于从前面完全遮挡了邱承墩这座土墩墓，影响了墓前神道的通视和环境景观（图五）。如果当初设计时将两侧的陈列馆建筑向两侧外推并整体前移，把整个邱承墩展现出来，并适当缩小建筑体量，土墩墓上的保护建筑也设计为脊长檐短、两面坡无檐墙的形式，鸿山遗址博物馆的外观应会更优¹⁴。

3. 遗址博物馆的保护展示性建筑

遗址博物馆如果承担遗址的研究、保护和展示的功能，就需要规划建设满足这些需求的相关建筑。遗址博物馆的馆舍建筑，除了遗址范围外建设的主馆即陈列馆外，在遗址内往往还有为了保护和展示重要遗迹而修建的遗迹馆等建筑。由于我国主要地区的遗址一般都是土木建筑毁弃降解形成的“软”遗址，要对遗址中这样的土木遗迹进行原状展示，就需要营建保护性建筑覆盖遗迹，才能防止雨雪阳光的损害（当然覆盖后也还需要采取隔断地下水、填充失水裂隙等措施）。遗址保护性建筑的作用就是保护暴露在地表的作为展品的遗迹，使之不因原状展示而受到损坏，而不是展示这座保护性建筑。

目前，不少遗址的保护性建筑设计过于追求建筑的外部形态，如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的土质建筑遗迹“女神庙”，其保护建筑的外观就好像某临街单位为节约地基而多占空间的平顶办公楼，而不像是一处文物的保护性建筑。该遗址大型石构建筑遗迹群“祭坛”的保护性建筑的体量和外形更是夸张，这座模仿红山文化玉器造型的建筑，既与同一设计单位在同一遗址中设计的“女神庙”保护建筑形态风格迥异，也大大增加了建筑结构的复杂性¹⁵。观众如果不是从空中观看或由导游提示，不会知道这座庞大建筑的设计意向原本是一件小小的玉器。这样的遗迹原址展示的保护性建筑设计并不妥当，新规划营建的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应当努力避免这样的问题。

遗址不外乎是已经废弃的城址、村落、专业或专门场所的废墟，每个遗址都是由多个子系统和要素按一定关系组成的复合系统，既不是一处单体的不可移动文物，更不是一件可移动文物。遗址的不可移动文物，也就是遗址中的那些重要遗迹，其现状形态或复原形态可以作为该遗迹保护展示建筑设计参考因素，却不宜作为遗址博物馆建筑造型的模仿对象。我们试想，一个古代都城遗址最重要的中心宫殿遗址尽管具有标志性，即使该宫殿基址的复原构想非常接近于真实，将这个造型的博物馆馆舍摆在遗址边缘或外围，也容易让观众产生对这个都城格局的错误印象。至于以遗址所在山形地貌作为大型遗址博物馆设计意象的做法更应该谨慎，在遗址所在山麓设计建造一座山丘形态的博物馆建筑，如前述钓鱼城遗址博物馆馆舍方案的造型意向相当于在原先的山丘前新造一座山丘，足以改变遗址的环境景观。至于遗址的可移动文物，本来就只是工艺品或雕塑品之类，不是古代的建筑物或构筑物，更不宜选取本遗址出土的代表性可移动文物的造型或纹样，将其极度放大转化为遗址博物馆馆舍造型。将只手可握的玉器、两手就可持举的铜器等文物造型放大或变形成为遗址博物馆馆舍的外形，作为建筑创作来说，也不是很好的设计创意。

需要强调的是，遗址博物馆的陈列馆是整个遗址的窗口和引导中心，如何能从陈列馆展望整个遗址，如何关联陈列馆与遗址，都是遗址博物馆馆舍建筑设计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遗址博物馆的展陈特点

一处遗址或遗址群，如果要规建遗址博物馆，就要同步启动遗址博物馆的展陈策划，然后进行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如果

遗址博物馆拥有全面研究遗址的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可以自己编写遗址博物馆的展陈大纲，形成展陈的内容设计初稿，然后再聘请相关方面的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修改、补充、强化、完善展陈的内容设计，最后再招标或委托有声誉的博物馆展陈设计机构，进行形式设计以实现内容设计思想的表达。不过，由于遗址博物馆往往位于乡村荒野，博物馆的历史往往也不长，如果本馆的确没有相关的人才储备，业主管理方在外聘有关方面编写展陈大纲和进行内容设计时，除了要聘请优秀的博物馆学和历史学学者外，更要延聘那些长期在该遗址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学者，通过考古学、（包括历史学）、博物馆学和设计学三方面学者的通力合作，编写出能够全面和准确展现遗址的历史、现状、特点和价值的展陈大纲，在此基础上完善遗址博物馆的内容设计，并最终完成遗址博物馆的形式设计。在具体展陈设计上，遗址博物馆方面和参与设计方面都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 统一设计遗址博物馆的展陈：兼顾室内和露天

遗址博物馆既然是整个遗址而不仅仅是遗址出土可移动文物的博物馆，在展陈设计上就要兼顾馆舍室内陈列和遗址露天展示。应该将遗址博物馆视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梳理这个系统的要素、子系统和关系，按照系统规划理论，将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建设结合起来，统一进行修建规划和展陈设计。遗址博物馆的室内陈列设计和露天展示设计应该一体化，而不是将二者分开甚至互不相干。即使遗址博物馆的室内陈列设计与露天展示设计不是同时开展的，担任展示设计的个人或单位也应该将室内或露天部分的设计置于遗址总体展示设计的框架中。只有这样，遗址博物馆的室内陈列设计和遗址的露天展示设计才会成为一个整体，不至于是互不相关的“两张皮”。

遗址博物馆由于必须展示遗址的不可移动文物，这些遗迹类展品往往体量巨大、残缺不全，大多数还全部或部分掩埋在地下，这就给展示手段提出了多样化要求。室内陈列馆除了要根据一般地方历史博物馆的基本陈列特点做好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展示好可移动文物藏品外，还要在遗址上做好不可移动文物（即仍然暴露在地表或被考古发掘揭露的建筑遗迹）的展示，以便能够展现遗址的发展过程、基本要素和主要内容。中国古代遗址大多数是土木构成的“软”遗址，抵御自然侵蚀的能力较弱，暴露在外土构遗迹会受到暴雨冲刷、冰冻冻融、植物滋生等威胁；即便是砖石构成的“硬”遗址，那些刚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建筑基址同样也会面临土遗址所遭受的自然侵蚀。此外，延续时间很长的古代遗址，遗迹之间的先后打破关系复杂，许多需要展示的遗迹已经面目全非，除了参与考古工作的考古学家可以读懂外，普通观众很难看明白。因此，必要的标识、修复甚至去除晚期的干扰，都是遗址展示需要研究的问题。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的都城规模的遗址，多数学者都认为该遗址有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早期王朝夏王朝的都城所在。遗址的原有边界尽管还不清楚，但遗址的中心宫城区及其大型宫室建筑、宫城四周的四条垂直相交的主干道、宫城北面的仓储区 16 和南面的作坊区都已经大致清楚。因此，可以考虑在博物馆的室内陈列和室外展示采取不同的展示手法，来呈现遗址发展的时间轴线和空间轴线。具体地说，在遗址以南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内，宜用可移动文物和图片模型等全面展示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兴起、发展、鼎盛、衰落的全过程以及遗址不同时期格局的变化；而在遗址内露天展示场所，则可以通过叠压在遗址主干道上的展示道路，原状标识或植物标识的宫城围墙和宫室，原状标识、提示标识甚至复原展示的粮仓和作坊，重点展现二里头文化鼎盛期即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平面布局。

遗址博物馆的展陈系统要从总体上进行功能划分，室内文物陈列与露天遗址展示彼此构成有机关联的两个子系统。室内文物陈列要发挥遗址的概览、门户、窗口和引导的作用。观众参观遗址博物馆时，首先来到位于遗址入口处的遗址陈列馆，就能够获得这个遗址或遗址群全部的基本信息，然后再参观遗址的遗迹展示或考古发掘现场，就能够将这个局部的遗迹植入整个遗址的时空框架中。统一规划设计遗址博物馆的室内陈列和露天展示，使二者彼此依存、相得益彰，而不是形成相互隔离的两处空间，这在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中至关重要，不得不优先考虑。

2. 合理规划遗址博物馆的游线

遗址博物馆的游线设计要考虑遗址本身的布局和路径，主陈列馆的位置宜在遗址本来的朝向端口和主要出入口，游线要与

遗址原有道路遗迹重合且与主要功能区合理衔接。要避免将遗址博物馆的主陈列馆选址于遗址后面，实在因某些客观问题不得不将主馆建设在遗址的后面或侧面的遗址博物馆，也要在游线设计中注意引导观众在参观完主馆室内陈列后，先绕行至遗址前面的出入口，再按照先后次第参观遗址。

湖北武汉市黄陂区的盘龙城遗址面河背水，前面是已经修建防护大堤的府河，左侧是盘龙湖，右侧是盘龙大道，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盘龙城考古遗址公园的陈列馆只能选址于遗址右后侧的非遗址区 17。因而，做好陈列馆与遗址区之间、遗址各功能要素之间的游线设计就非常重要。如果参观完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主馆后从展厅出来，先沿着遗址内城右侧的楼子湾和小嘴至遗址前部的府河大堤，在这里的小型停车场和观景平台居高临下观看已经位于府河大堤外的王家嘴地点（这里应该是盘龙城遗址最早聚落区的组成部分），然后从王家嘴进入府河大堤内，从“宫城”18 正门即南门进入，参观完宫殿区后再依次至杨家嘴和杨家湾参观考古工作站，又从楼子湾返回博物馆展厅前的停车场，就能够较好地领略盘龙城遗址的全貌（图六）。当然，如果观众时间充裕，也可以从博物馆主馆展厅出来后，先沿着艾家嘴至府河大堤，参观完王家嘴后进入城内参观“宫城”，然后参观年代较晚的居住区杨家湾和楼子湾墓地，再从那里沿着小嘴至府河大堤，沿着府河大堤至李家嘴，参观盘龙城等级最高的墓地，最后沿着杨家嘴、杨家湾、楼子湾路线回到博物馆主馆。这是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另一条比较合理的游线。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由于位于省会城市，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用地极其紧张，再加上当时还没意识到磨底河南岸金沙村一带只是遗址的祭祀区，早先就已发掘的磨底河北岸黄忠村一带的宫殿区和居住区因为城市扩展，现已成为城市建成区，故被列为遗址博物馆用地的区域主要是磨底河南的祭祀区及河北缘的一片文化堆积较少的区域。金沙遗址与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样，是规建在河两侧的都城遗址，根据笔者研究，这样的都城遗址是将东西贯穿的河流象征为天上的银河，将城市北部作为宫殿等行政区，城市南部作为宗教祭祀区，都城的主要出入口由于河流的分隔，也往往设置在东城墙的北部，也就是贯穿城市河流的北岸。因此，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主出口最好设定在遗址东北，即使因为种种问题的制约改设于遗址的南侧，由于遗址博物馆的主陈列馆位于遗址的北部，祭祀场所的遗迹馆位于遗址的南部，作为金沙遗址博物馆的最佳游线设计也应是：从南端大门进入后，先向北绕过祭祀区的西北缘，跨过磨底河先到陈列馆参观，从陈列馆基本陈列了解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发掘和收获，认识金沙遗址的全貌及其与相关遗址的关系及其历史背景后，再走出陈列馆眺望河对面的祭祀区和遗迹馆，然后再次跨过摸底河进入遗迹馆参观河畔祭祀场所现场，最后走出遗址博物馆大门或到遗址其他区域参观。这样的游线效果应该比现行的游线效果更好。



图六//盘龙城遗址公园游线改进设想

（图片来源：底图为盘龙城遗址博物馆提供，白色箭头为笔者所加游线构想）

3. 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设计

如前所述，遗址博物馆是由室内陈列和室外展示结合在一起的博物馆，因此，遗址博物馆的室内陈列须与遗址和遗址内的遗迹、遗物密切相关，如果不是出于比较的需要，不宜展出与本遗址不相关的文物。由于种种原因¹⁹，一些遗址博物馆被赋予收藏和展示遗址所在区域历史或遗址所属文化的功能，室内陈列厅不得不建设得很大，室内陈列也不得不兼顾展示遗址以外的区域或文化的实物资料，这就超越了遗址博物馆的目标和任务，不是遗址博物馆规建和展陈的恰当选择。

遗址博物馆展陈设计首先需要陈列馆室内陈列和遗址馆场露天展示设计的一体化，遗址博物馆主其事之人和展陈设计专家需要在充分把握和理解遗址考古材料的基础上，也就是掌握了遗址的年代跨度、发展节奏、范围边界、结构网络、功能属性、中心场域、标志节点、历史景象、文化内涵、价值意义等信息后，再基于遗址保护规划对遗址保护区划和控制要求，统一制定遗址的室内和室外展陈的基本策略，确定室内陈列和室外展示各自的目标、任务、内容、重点、特点、关系、衔接等，然后才组织展陈设计人员或聘请展陈设计团队设计遗址博物馆的展陈。

关于遗址博物馆的室内陈列设计，博物馆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的专家或专业团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该说足以应对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不过，中国固有的传统是不制作大型的人像和神像，而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制作人神之间的器具。除了如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这样的以寺庙遗址群为特征的遗址外²⁰，遗址出土的可移动文物多为历代实用或非实用器具的残件，没有大型立体的雕塑作品，要用这些文物充实体量高大的现代陈列馆展厅，设计师们往往勉为其难，尽管采取了许多方法，但有的室内陈列仍然不如人意。还有一个应当注意的问题是，由于遗址博物馆的规建多晚于遗址所在区域不同层级的区域博物馆，遗址历年出土的高品级文物可能并没有收藏在后建的遗址博物馆内，遗址博物馆在无法长期借用这些本遗址出土文物的情况下，往往会采取复制文物的方法来充实展陈。遗址博物馆的文物陈列不能混杂“假文物”，因为这有蒙蔽和欺骗观众之嫌。观众参观遗址博物馆，希望看到的是真实的遗址和遗物，以获得一种不同于通过图片、影像或数字传媒的“临场”和“在场”的感受。遗址博物馆的陈列若是出现了文物复制品且不加以标注说明，会严重影响遗址博物馆的声誉。

遗址博物馆的露天展示设计，目前通常的做法是由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等）主其事之人约请建筑规划学界的团队来完成。由于种种原因，既有的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露天展示的设计水平大都远远低于室内陈列设计，观众参观完被宣传美化的“遗址公园”，往往产生杂乱无章、莫名其妙的感觉，并不能准确理解整个遗址的文化内蕴。遗址博物馆的室外展示要根据遗址的性质特点、范围边界、功能分区、主要节点、可能的标志物等要素设计，不可本末倒置。我国的遗址大多位于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地理区域，遗址的遗迹现象往往深埋地下，地表往往是仍然在进行农事活动的农地，遗址面貌在地表难以看见（在草原荒漠地区，由于起伏的流沙和荒草的掩盖和干扰，即便从空中观看遗址，其面目也似是而非）。因此，作为遗址博物馆露天展示空间的遗址部分，基于遗址的性质和特点，合理规划设计遗址的地表道路和种植植物的种类，使遗址的外部轮廓、内部脉络和主要功能区能够为观众所辨识，是遗址博物馆室外展示成功的关键。

四、余论：慎重并郑重对待遗址标志

现代的重要遗址往往出土过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文物，如浙江河姆渡遗址的“双鸟托日骨牙器”，四川三星堆遗址的“凸目尖耳铜面像”、金沙遗址的“四鸟绕日金箔”等。这些文物的造型和纹饰当然具有鲜明的艺术性、经典性和代表性，可以并应该作为遗址的标志使用。不过，万事皆有度。一个遗址出土的文物，即使精美无比且文化底蕴丰富，但是如果其造型或图案被大量、反复、夸张地使用，除了会造成观众的视觉疲劳外，还会给观众某种错误的暗示，影响观众千里迢迢来遗址现场观摩真文物的效果。例如金沙遗址的“四鸟绕日金箔”，本来就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被广泛应用，在成都市区也随处可见被称作“太阳神鸟”的图案。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南门内广场、遗址馆前面、陈列馆中庭的地面和屋顶，全部都设计为巨大的圆形四鸟绕日图案的形态，当观众在陈列馆展厅中看见直径只有12厘米的“四鸟绕日金箔”原物后，面对这样的体量反差，要么会忽略这件重要文物，要么会产生对文物的失落感。因此，遗址博物馆园区内的标牌、装饰和雕塑，应尽可能简洁明快且不影响遗址的景观，这也是遗址博物馆展示设计中不可不注重的问题。

注释：

1[1]关于遗址博物馆的研究，目前除了吴永琪等的专著（吴永琪、李淑萍、张文立主编：《遗址博物馆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和一些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如黄洋：《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信息诠释与展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有综合性概述和论述外，主要有建筑学家对馆舍与环境、馆舍外部形态等设计理念和做法的综合阐述（如崔凯：《遗址博物馆设计浅谈》，《建筑学报》2009 年第 5 期），博物馆学家对主馆室内陈列的内容和形式设计进行专门或综合的讨论（如陆建松、朱峤：《浅议遗址博物馆的功能及其展示传播学术支撑体系建设》，《园林》2012 年第 4 期），其他论文多为以某一遗址博物馆为例，就遗址博物馆的某些问题进行阐发，其中关于遗址博物馆建筑的尤多。

2[2]关于遗址博物馆，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用以保护和研究人类历史所遗留的非移动性文化遗产和自然界的遗迹。其中包括城堡、村落、住室、作坊、寺庙、陵园以及有纪念性的旧址和古生物化石现场等。并以收藏和陈列遗址出土物为主，使之对公民进行科学、历史、文化知识传播的宣传教育机构。”（孙霄：《试论遗址博物馆的个性特征》，《中国博物馆》1989 年第 4 期）。这个定义不够准确，因为该定义将“遗址”与“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混淆了，除了自然遗产的古生物化石集中埋藏地可以另行讨论外，定义中其他文化遗产的类型，如城堡、村落等，都不属于遗址，除非这些建筑已经坍塌成为废墟，并且整个废墟与我们今天已经有一定的时间距离。

3[3]关于遗址博物馆的功能定位，考古学家张学海从七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这是笔者读到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关于遗址博物馆建设的论文。参见张学海：《遗址博物馆建设刍议》，《史前研究》1998 年，第 428-433 页。

4[4]关于钓鱼城遗址选址方案的信息，来自重庆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钓鱼城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选址论证报告方案设计》，2017 年。

5[5]《感受秦风吴韵——鸿山遗址博物馆、中国吴文化博物馆概况》，《新华日报》2008 年 12 月 16 日第 A08 版。

6[6]南京博物院、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7 年。

7[7]王毅、朱章义、王方：《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守护地——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博物馆》2009 年第 1 期。

8[8]关于遗址博物馆的研究功能，除了前述张学海的论文有所涉及外，张文立还有专文讨论遗址博物馆的科研问题。参见张文立：《遗址博物馆科学研究的探讨》，《文博》1985 年第 5 期。

9[9]李斌：《遗址博物馆原址展示与文物保护的统一——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为例》，《中国博物馆》2020 年第 2 期。

10[10]赵光付：《保护区外遗址博物馆建筑创新性浅析——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为例》，《中国博物馆》2020 年第 3 期。

11[11]程睿：《以晋国博物馆为例谈遗址保护中的建筑设计》，《山西建筑》2014 年 11 期。

12[12]同[4]。需要说明的是，钓鱼城遗址博物馆体量过大，这主要是因为合川区有关方面出于利用钓鱼城遗址公园游客中心的既有土地，以免另征土地增加建造成本的考虑，不是博物馆建筑设计的问题。

13[13]崔凯：《无锡鸿山遗址博物馆》，《建筑创作》2007 年第 8 期。

14[14]实际上作为高级贵族的吴越墓葬建筑，更可能是无墙体的人字形屋顶的长屋形建筑，如镇江地区一些土墩墓、浙江绍兴印山大墓一样。

15[15]关于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的馆舍建筑图像，可参见巨洒洒、杭侃：《遗址博物馆论稿》，《中国博物馆》2020年第3期。

16[16]二里头遗址北部中央的仓储区，过去曾一度误认为是祭祀区（参见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中原文物》2019年第4期），这是误将圆形的建筑基址密集的承重柱础神秘化了。曹大志已经撰文指出，二里头遗址这些建筑基址是圆形的粮仓（参见曹大志：《干栏式粮仓二题》，《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5期），这个意见应该是正确的。

17[17]a. 郭剑：《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新馆选址建设侧记》，《武汉文史资料》2020年第9期；b. 宋若虹、万琳：《考古学与遗址类博物馆的建设——以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为例》，《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1年第6期。

18[18]严格地说，应该称之为“衙城”，也就是以郑州商城为都城的商王朝管理南方地方政权官署所在城邑内的小城，而非商王朝都城中的商王宫殿所在宫城。

19[19]在这些原因中，博物馆址土地的征购矛盾和价格差异，是地方政府将本该建在城区的区域博物馆或文化博物馆规建于乡村遗址附近的一个重要原因。

20[20]实际上，博兴龙华寺遗址也是一个北朝建置城市的遗址，一度曾为乐陵郡治所。